

02
同心相知
同志相从

——各界人士回忆与共产党的交往



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序

何 国 模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以此为题征集到一些稿件，撰稿者包括各界人士，以其亲身经历和感受，表达出对党的钦敬心情。兹汇编成书，作为向党的生日献礼。

收入本书的各篇回忆史料，无不闪烁着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芒。有些同志，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共产党人就结为“风雨同舟”的战友；有些同志，怀着向往或同情革命的心情，在解放后立即以实际行动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也有些同志，向共产党靠拢是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的；更有些同志，冲破种种谣诬的困扰，毅然从国外或香港、台湾归来……每个人对共产党的认识各有其不同的思想过程，但通过自身的实践却悟出了一条共同的真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而且，有些同志经过多年的思想锻炼，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同志们在回忆中掘发出埋在心底的、当年开始接触共产党时那种纯朴真切的情感，读来令人信服和感动。

同志们的回忆史料，也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老 一 辈领导干部的思想风貌——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他们那种一心为

公、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那种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那种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为我们树立了生动的学习榜样。尤其是他们那种认真、热情、耐心地做好党的统战工作的精神，对我们更是非常有益的启迪。

古人论交友之道，有云：“同声自相应，同心自相知。”又云：“同明相见，同音相闻，同志相从。”本书兼取其意，名曰《同心相知，同志相从》。党的统一战线固然也是交朋友，但其目的却是为了治国安邦，民族振兴。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本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为着共同的目标，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

目 录

序.....	何国模 (1)
党引导我走上光明大道.....	资耀华 (1)
我心目中的邓大姐.....	万国权 (7)
解放初期印象记.....	赵今声 (13)
怀念黄松龄部长几件事.....	潘承孝 (19)
理解、信任和帮助	韩天耀 (25)
我的感受.....	杨坚白 (29)
坚定不移跟党走.....	乔维熊 (31)
党领导我们走向胜利.....	陈培烈 (36)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孙璧儒 (40)
难忘的岁月,美好的回忆.....	陈路得 (44)
回忆我在解放后的经历.....	杨骏昌 (52)
解放初期私营银行增资琐忆.....	杨纪年 (58)
犹忆天津解放时.....	邢公畹 (63)
解放初天津统战工作琐忆.....	王达津 (69)
忆解放初期的几件小事.....	杨思慎 (72)

7.6.13.2.

“掌握时间”.....	李世瑜 (77)
初与共产党接触的印象.....	王 锡 (81)
稳定我们信心的一次大会.....	董少臣 (85)
回忆一次活泼的大会.....	杨思慎 (88)
我和祖国同甘苦共患难.....	陈庸庵 (91)
解放初期采访忆旧.....	陈 珍 (97)
难以忘怀的往事.....	师静淑 (107)

铭刻在心中的诺言.....	陈茹玉 何炳林 (113)
振兴中华，矢志不渝.....	陈荣憐 (119)
中国——我为你骄傲.....	黄其兴 (124)
共产党的光辉形象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马淑贞 (129)
飞向大陆.....	孙志强 (133)
我选择了回归大陆的道路.....	袁家楫 (138)

我接触到的第一位共产党人

——郭宗鉴烈士.....	高承志 (142)
四十前往事回忆.....	袁东衣 (147)
党指引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王大川 (157)
血肉相连六十年.....	张澜生 (161)
在党的教导下前进.....	张远谋 (164)
新的启蒙.....	唐宝心 (167)
党的伟大形象深深扎根在我的心中.....	丁毅华 (171)

与中共干部的第一次接触·····	许功锐(175)
党的统战政策深深地感动了我·····	刘清芬(178)
毛主席治党治国有道·····	鲍毓麟(183)
难变也得变·····	骆玉笙(186)
文艺工作者的知心朋友·····	周楚 林默予(193)
新旧社会两重天·····	马三立(196)
苦尽甘来心向党·····	陈佩华(201)
共产党人的光辉典范·····	左道胰(206)
党的恩情永不忘·····	戴鼐英(212)
团结是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保证·····	王士萃(219)
镌刻在心中的往事·····	黄扶先(224)

资 耀 华

党引导我 走上光明大道

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的喜庆日子来到了。我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今年整整91岁。我一生经历了清朝、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历史时期，亲眼看到了封建、列强、军阀和国民党统治带给中国人民的种种苦难，也看到了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我在青年时代曾参加过种种救国救民的尝试，以后一直从事经济工作，回顾一生，我感到是党引导我走上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我16岁时到日本留学，以后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经济。1926年毕业后回到北京。本想从此做一番事业报效祖国，詎料竟到处碰壁，最后在一家北洋军阀与日本合办的汇业银行充当实习员，靠打算盘、记数字换取每月60元的工资，最后连这个饭碗也没有保住。1928年，正当我再度陷入失业危机之时，幸蒙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相邀加入该行，为该行筹建调查部。根据在日本所学，从此在国内首次开创了征信业务，并取得了显著效果。1933年被银行资送美国，进宾夕法尼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深入研究金融制度和银行经营课题，

直到1935年返回上海。这时日本加紧对我国侵略步伐，华北风云日紧。我行装甫卸便受命接任上海银行天津分行经理，从此举家迁来天津居住。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平津沦陷，我身居沦陷区内，利用各种手段与敌伪周旋，拒任伪职，终于保全了天津分行的资财，保全了自己的名节。

抗战胜利后，我亲眼目睹多少汉奸摇身变为国民党政府接收大员，他们大发“劫搜”横财，抗战人士受迫害，爱国青年被捕杀。最后我发现自己也处境险恶，乃于1947年秋再度请准赴美，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金融政策课题。在我离津之前，国内政治形势混乱，美国参与调处，成立军调部，我有位多年未见老友沈其震以中共代表身份在内，实出我意料。他在前往北平赴任途经天津时特来我家相访。在长谈中他向我详述了当前形势和共产党的一些政策、主张，并诚挚地劝我说：“你是个爱国的知识分子，历史证明，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救国救民主张，才是唯一拯救民族危亡、振兴祖国的正确道路。”他建议我到解放了的张家口去看看，并建议我积极参加组建民主党派工作，为建立自由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与共产党真诚合作。此外，我爱人童益君的侄女童晓礼也是个中共地下党员，当时正在北平燕京大学读书，经常住在我家，平时对我讲述过很多解放区的新人新事以及国民党统治区青年学生们的爱国斗争情况，有几次她还把被特务追踪的同学带来我家躲避，我还亲自为她的几位同学代购车船票，帮助他们逃离天津潜赴解放区。另一位亲戚方维吾，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经常劝说我应解除疑虑，跟着共产党走救国的道路。正因为有这许多中共党员的帮助，使我逐渐走上了限定共产党实现救国救民主张的途径。那时尚处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由于我和地下党员及爱国青年的来往，引起了

反动当局的注意。时任天津市警察局长的李汉元，因与我同属一个留学生组织——“仁社”，曾暗中向我提出警告，劝我暂避，这就是1947年末我再次赴美的主要原因。

1948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期间，正是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我尽量利用在国外的便利条件，通过当地一家书店，购读了大量中国共产党的书刊，如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大大开阔了思想境界，更加坚定了我跟着共产党走救民救国道路的决心。随着解放战争捷报频传，我再也不能留在国外了，尽管当时美国当局百般阻挠，部分不明真相的留美人员徘徊徬徨，我还是决定立刻回国，赶到天津迎接解放。

我于1948年底乘飞机经香港回到上海，换乘最后一班民航客机到达解放大军即将合围的北平，换乘火车，在炮声隆隆中回到天津。当时我认识的许多熟人正在纷纷逃离，有的还悄悄问我何以偏在这个生死关头回来？我泰然自若地劝他们不必惊恐。我对他们说：“战火很快就会结束，我是特意赶回来迎接解放的。”盐业银行经理陈亦侯、招商局经理张庆枬、华北电讯局局长黄如祖等，终于接受了我的忠告留了下来。

1949年1月16日天津解放的第二天，硝烟甫散，我便被请到军管处，受到金融系统领导人曾凌、向明、何松亭等同志的亲切接见，就接收和整顿天津金融方面的问题征求我的意见。这是我初次会见中共的领导干部，他们诚挚的态度深深感动了我，当时我便坦率地提出三项建议：①支持所有私营银行、钱庄立即复业，以尽快恢复市场，繁荣经济；②保存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名称及其在海内外的组织机构，充分加以利用，以恢复并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③以优惠兑率兑换市民持有的国民

党金圆券，保护群众利益。1月16日人民银行成立，次日全市私营银行、钱庄恢复营业。1月22日人民银行正式公布了以6:1比率兑换金圆券（后又改8:1，10:1），同时公布了对工人、学生、职员的優惠兑率为3:1。

解放后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意气风发，热情高涨。虽然已近半百之年，但在我的人生中却真正是风茂年华。在党的教育下，我对于党的认识逐渐提高，对于“国家资本主义”金融事业的理论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从而下定了跟着党走，献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决心。为了支持国家建设，在天津解放后的几天之内，我便指示上海银行天津分行主动与人民银行联系，代理中国银行的国外业务。我多次向上海银行的同仁们申述这一工作对于开展华北外贸、安定民生、支援前线解放全中国的重大意义。为了充实该行外汇部的力量，我从各方面抽调人手，并要求上海总行向天津调来25万元外汇作为储备。3月份华北人民政府外贸管理处正式成立，为了掌握香港地区及国外市场动态，委托我行通过香港上海银行每天电告香港干果、杂货、化工、西药等行情，以及美国道·琼斯指数变化情况。这些电报每天都由我亲自审核后转送外贸局。嗣后，人民政府又陆续公布了外汇和外贸管理办法。翌年3月天津开始办理外汇银行和进口商登记，同时筹办外汇交易所。我行与金城、汇丰等15家中外银行被指定为外汇银行，获准参加外汇交易所。外汇交易所以中国银行为主任，我曾以副主任上海银行名义主持召开外汇银行座谈会，从此彻底改变了过去外汇交易由外国银行操纵把持的局面。

由于我初次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建国初期的恢复国民经济工作中协助党和政府做了一些工作，党和政府便给了我极大

信任和殊荣，邀请我参加了1949年春在北平召开的中共中央欢迎各地民主人士的和平大会。同年9月又应邀随同黄敬市长一起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光荣地出席了10月1日天安门开国大典。

坚定地跟随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时在我的思想中已不容置疑，但具体到我个人毕生所从事的金融事业，我常想到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重要位置，总感到它必须率先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才能保证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发展。因此当1949年我在参加民主人士和平大会期间，便向黄敬市长以及民主建国会元老、金融专家章乃器先生等探讨过这个问题。后在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共同纲领时，这个想法更趋于明确。不久，天津市举行人民代表会议，我再次向党和政府提出这个将私营金融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设想，立刻受到黄敬市长的支持，并提出以上海银行为试点的建议。他还介绍我去北京面见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等同志，初步提出由人民银行购买上海银行部分股票的办法。这时上海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光甫和部分董事已移居香港，董事会已决议由我担任总经理。为了实现合营的设想，我于1950年春亲赴香港，向陈光甫和董事会做了大量说服与解释工作，终于达成三点协议：①同意人民银行收购上海银行部分股票并参加董事会；②将上海银行总管理处由上海迁至北京，以便进行合营工作；③上海银行香港分行与总管理处脱离关系，在港另行注册，独立经营。陈光甫本人未回大陆，只派朱如堂、徐谢康二位常务董事随我回到北京。

1950年5月31日我代表上海银行正式提出公私合营申请，9天后便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7月2日人民银行以每股25

万元（旧人民币）价格收购上海银行股票25322股，并指派9人参加董事会。9月1日上海银行正式改名为公私合营上海银行，我被推为总经理，开创了我国私营银行公私合营的先例。1952年我又被任命为金融业公私合营联合总处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此外，我还担任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副董事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等职，并自1959年迄今，一直担任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主任。不久前我还代表人民银行到香港处理公务。

除了金融工作外，解放以来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民主建国会与工商业联合会的活动。远在1949年9月，我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大会期间，便接受了中国民主建国会领导人施复亮、章乃器等人提出的与李烛尘一起筹建天津市民主建国会的任务。该会于1950年9月24日正式成立，我当选为副主委。1953年“三反”“五反”运动中我受到不应有的冲击，承蒙中央领导给予公正处理，将我调至北京，任民建中央历届委员，二、三届中央常委，全国工商联二届执委，三、四届常委，我还是全国政协三、四、五、六、七届委员。

回顾自己一生追求振兴祖国的道路，只有在解放后才找到了党领导的光明之路。最近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更感到党的英明伟大。这个建议完全表达了我毕生的心愿！我决心继续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这个宏伟纲领而奋斗，坚信这个理想必能如期实现。

（敬瑞整理）

（作者资耀华，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中央咨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银行常务董事，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万 国 权

我 心 目 中 的

邓 大 姐

解放以来，做为一名原工商业者和民主党派人士，我曾与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一般干部多年共事，有过不少工作联系和个人交往，也曾多次接触中共高层领导干部，感触也很多。许多优秀品质、高尚精神体现在这些党员、干部身上。然而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次，是1984年6、7月间邓颖超同志到天津视察时，我亲身经历的两三件事。

邓大姐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在津期间，她分别会见了全国政协在津委员和市政协全体常委。这两次活动我都参加了。

第一次会见时，我受天津市政协主席陈冰委托，把在津全国政协委员一一介绍给邓大姐。她详细地询问每一位委员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问大家有什么困难，耐心地听取各位委员对政协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和要求，并要求天津市委和市政协，能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一定要及时解决。第二次是与天津市政协全体常委座谈。人一到齐，邓大姐就开门见山地说：“今天开会，我说说你们说说，你们说说我再说说，我不做独角演员，

大家都发言多提意见。我到天津，就是来集思广益，把大家的意见反映到党中央，反映到全国政协，让我们同心同德，建设四化。”大家被她亲切、风趣的开场白所感动，一下子活跃起来，纷纷发言，十分踊跃。大家对全国政协工作、落实政策工作、天津市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和整党工作，谈了很多诚恳意见和有益建议。

邓大姐认真听了大家发言后说：“同志们发表的意见，我很受教益。大家对一些事很着急，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事情可以马上解决，有些事情还需要创造条件加以解决。现在，党中央、国务院在处理国内外大事中，一件一件都抓得很紧，抓得很勤，担子很重。有些事可以马上解决的，就象刚才几位常委提的意见，已经当场解决了。有些事情解决起来需要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就老老实实在地讲，我们面临着一些什么困难，

‘四人帮’是怎么破坏的，现在我们是怎样努力去办的，实事求是地讲，人民群众是会谅解的。”最后，她又很恳切地对我们说：“要把个人的工作和整个国家、政府的工作结合起来，同心同德，把劲使到一处去，我们的工作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成绩。”

座谈中间，她和蔼可亲认真倾听的神态，对政协各界人士无微不至的关怀，不仅使我，而且使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感到非常温暖，感到邓大姐是在实实在在地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感到座谈、会见本身就是贯彻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的生动体现。

在津期间，邓大姐还主动提出要去看望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天津市人大副主任、天津工商界代表人士周叔弢先生的遗

端左道腴大姐。那次是由市委书记张再旺、市政协主席陈冰、副主席王恩惠同志和我陪同，乘坐一辆小面包车在左大姐家中探望的。本来，有关部门听说邓大姐要看望左大姐，考虑到邓大姐的年纪和那段时间活动安排较多，为照顾她的身体，计划把左大姐接到宾馆。但邓大姐不同意，执意要亲自登门探望。

在去左大姐家的路上，陈冰同志把我的情况介绍给邓大姐，邓大姐热情地招呼我坐在她附近的座位上，风趣地和我开玩笑：“万国权，你的权力可不小呀，万国的大权哪！”引得全车的人都笑了。我汇报了周叔弢同志患病后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千方百计组织抢救和周老逝世后妥善安置遗属的情况，邓大姐不住地点头表示满意。

在左大姐家里，邓大姐对周老去世后未能及时来看望左大姐表示歉意，并对周老生前的爱国主义精神做了高度评价。在周老生病期间，邓大姐特意委托孙起孟同志亲自来津看望。左大姐为亲身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而掉下了热泪。两位老大姐像亲人一样共同回忆了周老逝世前一段时间的生活情况和政治活动情况，特别是在他逝世前一年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前后后的情况。邓大姐回忆说：“周老的逝世，也许和那次会议劳累有关。那次会议快结束时，周老找到我，叫了一声邓主席，说我预先向你请假，下次会议不能参加了。没想到这竟成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也许当时他已有预感了。”左大姐说，当时他的腿已经肿了，回来就便血，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

邓大姐安慰左大姐说：周老已经去世，你不必过份悲痛，要达观一些。对死者无益，对自己身体健康也不利，何况周老

活到93岁高龄，死后哀荣呢！左大姐怀着激动的心情直点头。邓大姐还关心地询问左大姐的健康情况，知道她心脏有些毛病时，开导她要乐观些，并说心脏病并不可怕，心脏病多数是长寿病，是延年益寿病。我和在场的人都笑了。她还说：“我是高血糖，医生说，医治这种病有三种办法，一是打针吃药，二是饿肚子，三是运动。我采取了第三种办法，每天饭前走一千步，饭后走两百步，天天坚持，果然血糖降下来了。”邓大姐看到茶几上放的水果糖说：“你的糖很好，我是高血糖，医生是不让我吃糖的。今天看到你的糖这么好，我也要吃一块，而且我要代你招待一下客人。”说着，分给在座的每位同志一块糖，并请大家喝茶：“主人倒了这么好的茶，为什么不喝呢！”气氛越来越轻松，左大姐也被邓大姐对待疾病的乐观主义精神所感染而愉快地笑起来。

当左大姐问邓大姐是哪里人时，邓大姐很有感情地说：“我算是半个天津人吧！我祖籍河南，出生在广西，6岁到天津，一直在天津生活了十来年。”

后来，左大姐又谈起年初召开的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她说邓大姐开会太辛苦了，还要深入到小组参加讨论。邓大姐说：“我原本想每个小组都去听一听，但实在参加不过来。我总是愿意和大家多见面的。像万国权，那次开会我坐台上，他坐台下，现在终于在天津见面了。”

临走前，邓大姐一再嘱咐左大姐，有困难就提出来，找市委书记、市政协主席和副主席。还说：“听说你的儿女对你很孝顺，这我就放心了。”说着，就招呼左大姐的孙子过来，同他握了手，嘱咐他要好好照顾奶奶。然后两位老大姐互相搀扶着走到二门外，合影留念后，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邓大姐给我的印象十分平易近人、思想敏捷、风趣幽默，为人热情，替别人想得细致周到，没有丝毫领导者的架子。

在津期间，邓大姐还曾亲自冒雨到市查抄物资清退认领处，深入了解天津市落实情况。

使我终生难以忘怀的一件事，是那不久以后的7月1日，中共天津市委招待处打电话给我，说邓大姐要会见我和我夫人刘宗华，我们俩感到意外的高兴和激动。那天在座的还有陈冰主席和邓大姐的秘书赵炜同志。

见到邓大姐后，她热情地对我们说：“今天是党的生日，我请你们来更有意义。我们算是世交了。我听彭真同志讲，你父亲给党做了不少工作，吕正操同志原来就在你父亲的部队里，共产党历来对各界爱国人士、对中国人民的事业做过贡献和出过力的，是不会忘记的。你是党的朋友。今天特别请你来谈谈，拿你当最亲近的人接待。”这一席话，使我感慨万千，是任何一堂政治课、任何一次政治报告都无法比拟的。我直觉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的关怀、爱护与长期合作精神，感到党的统一战线的英明伟大，感觉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和力量所在。

在交谈中，她详细问了我的家庭、子女、生活、住房等情况，其无微不至，使我和我的夫人终生难忘。

后来，她从有关方面知道我当时住房比较困难，要天津市帮助我解决。1984年下半年我调到北京民建中央工作，她并不知道调动的事，可她一直把我这样一位民主党派干部住房困难的情况记在心上。1985年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还特别提出，天津万国权的住房问题一定要解决。全国政协的同志告诉她，不用了，万国权已调到北京民建中央机关工